

应景与造景：森林变迁与尧山圣母信仰关系研究^{*}

侯晓东

(宝鸡文理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

[摘要]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的森林变迁,不仅是自然植被的变化过程,也是区域景观的更新过程。从区域景观变迁的角度而言,这样的变迁不仅带来自然环境方面的变化,也在社会文化方面产生了相应的景观效应。通过对尧山地区森林植被变迁过程与尧山圣母信仰形成之间关系的讨论,可以发现,以森林为主的生态景观,从信仰形成期的应景到后期发展中的造景有一个变化过程。

[关键词]森林变迁;景观效应;尧山圣母信仰

[中图分类号] K90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193(2018)03-036-07

本文所研究的尧山圣母信仰,地处关中东部地区,属于关中平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历史时期,主要属于蒲城行政范围。^①这一地区的森林植被及其相关生态环境要素经历了大规模的变迁,不仅对此区域的自然生态环境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于此后这一地区综合性景观尧山圣母信仰景观的形成,也具有重要意义。此前,学界对尧山及周边区域环境变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然环境变迁本身,特别是森林植被变迁方面。即通过对这一区域森林变迁过程的复原,讨论其历史时期的植被状况及其变迁过程,分析人类因素在此变迁过程中的影响程度,为此后的植被恢复提供有效指导等方面。^{[1](P433-511)}但是,森林植被作为最易遭受破坏的生态要素之一,不仅对于区域生态系统的维持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是一个地区显性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森林植被的变迁不仅带来自然生态方面的多样性变化,而且对区域景观特点,人们对于相关景观价值的评估与认知,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自然环境特别是森林植被的变化,是否也对地域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产生影响,其影响的机制何在?对于这一方

面的问题,此前学界缺乏应有的关注。而本文在梳理尧山山脉及其周边区域自然环境特别是森林植被变迁的基础上,讨论地处这一区域的尧山圣母信仰景观形成与区域植被变迁之间的关系,展示区域森林植被变迁所包含和可能产生的社会文化效应。

一、区域环境变迁的基本过程

“简公六年(前409),铎洛。城重泉。”^{[2](P200)}此处的重泉,就是现在的蒲城。能在这时期设县,就证明当时蒲城县域已经开始了一定规模的农业开发。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蒲城县基本地理地形南北差异较大,县城南部属关中平原,地势平坦,有水利灌溉之便,基本农业生产条件优良。县城以北地区,开始进入黄土高原,也就是当地人俗称的“北山地区”。长期以来,这一地区几乎没有水利设施,至今仍以旱作农业为主,靠天吃饭。因此,这一时期地域开发主要集中在南部的平原地区。北部尧山山脉及更北的山地,基本仍旧保持了其原有植被状态。现有相关研究也表明,一直到西汉时期,关中地域开发虽然有向东北方向

* [收稿日期]2017-11-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民间佛教信仰及其东传研究(项目编号:16JJD730005)。

[作者简介]侯晓东(1983-),男,陕西蒲城人,历史学博士,宝鸡文理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区域历史地理及社会史。

36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转移的趋势,但仍主要集中在具有水利之便的平原地区。^{[3](P16-17)} 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中地区迭经战乱,森林植被的基本状况没有发生太大改变。此后的隋唐时期,中央王朝再次定都关中,关中及其周边地区才进入地域开发的另一个重要时期。^{[1](P392)}

具体到尧山及其南北地区而言,唐太宗于贞观十四年(640)“闰月乙未,幸同州。甲辰,狩于尧山。”^{[4](P52)} 这一地区能够满足皇帝巡行狩猎一类的大型活动,可见,直至唐初尧山及其周边地区,植被应该依然茂盛,野生动物数量也可能较多。“(员)半千事五君,有清白洁,年老不衰,乐山水自放。开元九年,游尧山、沮水间,爱其地,遂定居。卒,年九十四,即葬焉。吏民哭野中。”^{[5](P4162)} 开元九年(721),唐代名臣员半千也对尧山景致多有欣赏,十分喜爱。因此可以基本断定,这一地区至少在唐代前期仍然是植被繁茂,景色宜人。但是,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尧山南北地区的地域开发力度加大,植被发生较大变化。

一般而言,地域开发的规模与程度,与人口的数量,特别是农业人口及农业用地的变化存在密切关系。区域人口的明显增加,必然会对地区植被产生重要影响。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唐朝兵制改革,关中地区设置的折冲府数量最多,也是地域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而这些设置在关中地区的折冲府兵,仅紧接尧山南部地区,就设立五处折冲府。如“伏龙”“温阳”等府名,仍旧作为地名使用。^{[5](P1327)} 按照当时兵制人数“凡府三等:兵(一)千二百人为上,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5](P1325)} 这一地区一次性就接纳人口五千人左右。应该注意的是,唐代的府兵制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安定时期,主要进行农业生产。这五千左右的士兵加上其家属等相关人员,对此地区而言,是一个很大的人口增量,必然促进地域农业开发的规模与深度。

这一地区人口增加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唐代中后期,桥陵、泰陵、景陵、光陵和惠陵在这一地区的设置。“天宝十三载二月制。献、昭、干、定、桥五署,改为台令。各升一阶,自后诸陵,例皆称台。”^[6] 每个陵邑设定以后,都相应地设置了管理和服务机构,也就是在台令之下有大量服务于帝陵管理的人员。此后不久“丙申,谒桥陵……制奉先县同赤县,以所管万三百户供陵寝,三府兵马供宿卫”^{[4](P207)} 加之唐玄宗将其父的桥陵所在的蒲城县改名奉先县,行政级别上升为赤县。当然,这

些行政措施对于这一地区的人口增加,相对属于间接措施,而后更有直接采取“每陵取侧近六乡供陵寝。”^{[5](P209)} 这样就直接增加了陵寝设置区域的人口数量。

大量人口拥入尧山附近区域,首先需要相应的粮食供应,这些人口的粮食需求基本依靠当地解决,因此使得这一地区的开发速度加快,而这一开发过程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地表植被。也就是说,唐代是这一区域环境变化的拐点时期,至少是地表植被剧烈变化的时期。史念海先生对黄土高原森林变迁的相关研究显示,关中平原地区的林木资源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得到大规模开发,隋唐时期,林木开发的重点已经转向周边山区,而尧山所在的关中东部地区也不例外,成为唐代地域开发的主要区域。^{[1](P299)}

此后,由于蒲城县域政治中心的东移和政治地位的下降,导致人口波动较大,但是,仍属于陕西的地域开发重点区域。^{[7](P85-120)} 首先从地域结构方面而言,蒲城作为关中地区的组成部分,是陕西较为适宜农业生产的区域,至今仍属于陕西人口均值较高的地区。此外,宋明以来随着农业新品种的引进、技术的改进等,唐以后关中地区的人口数量虽有波动,但是,地域开发的强度有增无减,而这一地区也不例外。其次,从尧山地区的地理地形角度而言,相较于县域的南部地区,这一属于山区的尧山地区,也正如中国其他山区一样,在宋以后,成为农业开发的重点区域。王元林的《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研究》已经注意到:“明清民国,关中诸泉渠变化最为明显。其实,这种变化从唐代以后已经开始,宋元时《太平寰宇记》和《长安志》《类编长安志》都未注意期间湖池陂泉的渐缩,而只是一味按前代的记载加以照搬。”^{[8](P203)} 因此,总体而言,尧山所在的关中区域环境变迁表现出了独特的节奏与特点,特别是在环境的人口承载力方面,并没有与其他区域一样,在明清时期才出现限值,而是早在唐宋时期,区域开发就已经基本完成。特别是灌溉水源,至清初,整个蒲城县域已经是地表径流稀少,“境内止漫泉一曲,可灌苇田数亩,余平路、晋王数泉,龠合水耳,故岁常苦旱。”^[9] 而且仅有的漫泉一曲,也在解放初干涸,现在仅作为行洪河道存在。^{[10](P61)}

由此可见,尧山圣母信仰所在区域,从行政区划方面而言,属于关中平原,但从基本地形构造的角度而言,属于关中平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

因此,历史时期属于同黄土高原一样的缺水地区。因地理地形的原因,虽属同一县域,但却从来没有建立起相对有效的灌溉设施,靠天吃饭的旱作农业基本延续至今。此外,这一区域虽在汉唐时期属于政治核心区,除去皇家陵园和特定时期赤县的设置以外,更多的却是因区域人口增加所带来的地域开发强度的增加和生态环境的改变。地域开发的不平衡性、旱作农业,加之尧山的所处位置、地理地形和环境变迁特点,使得这一地区形成了自己较为独特的人地互动模式。从而在此区域形成的具有地域特点的尧山圣母信仰,就为我们探讨这种独特的地域人地关系提供了可能。

二、自然景观效应与尧山圣母信仰之形成

现有资料显示,在尧山的求雨活动至迟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地域开发的不平衡性和基本环境的改变,为尧山圣母信仰的出现提供了可能,进而形成了地区环境变迁与具有一定神圣性的尧山圣母信仰区特有景观关系的构建,通过这种关系的进一步梳理,进而指出自然环境变迁中所造成的景观变迁在尧山圣母信仰形成中的可能意义。

前文已经指出,唐代是这一地区森林植被变迁的一个关键时期。但是,其与尧山圣母与信仰景观之间的关系建立,则必然开始于尧山圣母形成时期,因此,对尧山圣母形成时间的界定,就成为探讨尧山圣母信仰这一特定景观与区域环境变迁的关键之一。关于尧山圣母的形成时间,先看下面相关的题刻:

□日□□雨记之,贞元十四年秋七月廿。

前太原府□□裴□,前国子监主簿崔務。^②

唐之碑碣,仅有存者,亦莫知其神之来矣。^③

尧山在邑北二十里,上有灵应夫人庙,不详其昉自何时也。考县志,唐咸通中碑云:自古灵应,未知肇兴何代。至宋崇宁二年,有司以祷雨辄应,奏其事于在所,遂敕封焉。^④

通过以上的三段材料可以发现,不论是从现存碑刻资料,还是从历史时期相关碑刻资料的追述都显示,尧山圣母信仰可能形成于唐代中期,至少在唐代中期,尧山已经成为关中地区人们祈求甘霖的场所之一。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地域信仰形成的过程中,正如碑刻中所述,“茂林丛竹之间,宛若画图,实一境之胜概也。”^{[14](P212)}“尧峪仙坪”及周围森林的保存,可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

景观点睛作用。其实,在尧山圣母形成的唐代,恰恰也是尧山及周边区域森林植被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因而有理由相信,随着地域开发的加速,使得原来广泛分布的森林植被稀缺度日益凸显,而尧山圣母信仰所在的“尧峪仙坪”,因其森林的保存为人们所注意,进而在“尧峪仙坪”这一特定地点形成森林景观效应。当然,仅有自然景观效应的凸显,并不能构成尧山圣母信仰与森林变迁的直接相关。下面将从更为重要的尧山圣母信仰地点的选择及其主要信仰功能方面,分析两者之间更为多样的内在联系。

“尧山又名‘浮山’,位于县城以北 12 公里,东北—西南走向,长约 18 公里,宽 3~5 公里,主峰海拔 1091.6 米。”^{[10](P58)}在这一范围内,尧山圣母信仰仪式举行具体地点的选择,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尧山圣母庙所在的“尧峪仙坪”位于尧山主峰南边接近山顶的一个山间平台之上。当然,这一地点的选定,首要原因可能就是其位置的特殊性。就蒲城县域而言,县北一带,虽然“冈峦重叠”,但是,大多为海拔仅七八百米的小山峰。尧山海拔超过千米的主峰,其在地域的相对高度十分明显。当然,“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仅有特别的高度,并不足以确保其在尧山圣母信仰构建中的特殊位置。除去其在海拔高度上的特别以外,尧山圣母神庙系统的中心能够确定在这一地点建立,可能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

从地域开发的角度而言,一个基本的规律或者现象,就是人们对地表形态的干涉或者开发一般都是由易向难,具体到这一地区就是从山脚向山顶的开发过程,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尧峪仙坪”所在的尧山主峰森林植被只有在地域开发的后期才能被人们注意。山脉顶端区域森林植被开发相对较晚,从而使得尧山山脉主峰的景观价值得以凸显。此外,前文已经指出,尧山所在的蒲城以北地区,属于水资源缺乏地区。因此这一地域的民间信仰,一般多有求雨功能。“灵应夫人祠旁有牧鉴泉,龙池泉,水清冷不竭,或愆阳酌其水,雩祭则雨,北一泉较大,若浴盘。水止盈坎不流。”^[9]而尧山圣母祠近在咫尺的泉水资源,也是尧山圣母信仰地点确定在“尧峪仙坪”的重要原因。庙宇附近具有象征意义的泉水资源,作为人们求雨过程中的重要道具,显然在具有求雨功能的神庙周围就十分重要。“蒲北群山纠纷,峰峦耸翠,环山之谷,灵泉涌出。世传曾有女仙,衣珠翠,

乘白马,时或隐现于斯,士民祷雨祈嗣,每有感应。”^⑤形成信仰中心以后,在信仰者心中泉水已经不是普通的泉水,而是扮演着特殊功能的神泉、灵泉。因此在这个缺水的干旱半干旱地区,泉水加上高山,就已经初步具有了象征性景观的特点。

上面主要从尧山圣母信仰具体祭祀地点与森林变迁之间的关系做了分析,可以发现,“尧峪仙坪”所在的尧山主峰的海拔可能是这一地点确定的直接原因。但从更为深层的意义上而言,森林植被变迁仍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首先随着森林资源的开发,森林植被的稀缺性,成为尧山圣母信仰这一综合性人文景观形成的基础性要素。而且正是地域开发的内在规律,决定了森林景观在尧山主峰的无意性保存。当然作为具有点睛作用的泉水资源,更依赖于一定的森林植被的涵养水源作用。从区域生态的角度而言,相当数量植被的存在,除具有自然景观效应以外,对于维持区域的基本生态平衡也颇具意义。“尧峪仙坪”及周边区域在历史时期植被较为密集,尧山地区,特别是尧山主峰的地理地形结构加上这些树林,有利于区域内湿热气流在特定地点的凝聚,进而形成较多的降水。在气候学上可能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气候岛”效应。^{[11](P80,P113)}再加上森林植被的涵养水源作用,可以说保证了泉水资源的持续性,维持了自然景观的完整性。森林植被的作用也正如碑文中对这一地理空间的景观所描述的那样“奇泉混混,古柏苍苍。兴云降雨,物阜民康”。^⑥

“尧山为邑北屏障,相传圣母主立其上,乞嗣祷雨,有求辄应,唐宋来敕封灵应夫人……夫神而能锡胤以绵瓜瓞,作云以布甘霖,是大有造于吾民也,祀之宜矣。”^⑦最后,通过尧山圣母这一信仰的主要功能与地域开发之间的关系做一简单分析,讨论森林植被在尧山圣母信仰形成中更为丰富的意义。

“作云布甘霖”和“锡胤绵瓜瓞”两大功能,是尧山圣母得到地方民众祭祀和信奉的主要原因。相较于“锡胤绵瓜瓞”,“作云布甘霖”,可以说,是一种社会性需求的表现。尧山所在的蒲城县南北地理地形差异较大。唐代以前,人口主要分布在南部拥有灌溉之利的平原地区。唐代以后,数座帝陵在北部尧山地区的设置,使得这一地区人口大量增加。这些大量增加的人口不仅带来森林植被的变迁,而且因为地形高亢,难以灌溉,人们为适应特定地域的自然环境,因此发展出一种旱作农业区特有的求雨仪式。

而且现有资料表明,唐代后期,至少在关中东部地区,求雨活动已经与理政、爱民一起,成为一个官员政绩和得到民众认可的重要方面。“贞元乙亥……振振崔公,聿来自东,字我邦人,如姬如翁。公与折衷,察见情伪,断适轻重。岁或愆阳,公心不遑。祷则霁需,赐我丰穰。”^{[12](P469)}这里的崔公当指于贞元十五年求雨尧山的崔务,也是现存到尧山求雨的最早记录。由此可见尧山圣母信仰在唐代中后期,可能在区域社会已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因此可以说正是拥入这一地区的人群,不仅在社会需求上发展出尧山圣母信仰,也是他们为自己提供了尧山圣母信仰形成的基础性森林景观。从此意义上而言,地域开发、森林变迁与尧山圣母信仰形成之间有着十分微妙的互动关系。

三、森林的变迁与尧山圣母信仰形成之间的关系

尧山圣母所在区域的高山、清泉,特别是森林景观,其本身的延续性及此后人文景观的叠加,可以说,是一个长期互动发展的过程。前文已经指出,可能在唐以前,此类景观在这一地区并不具有明显的景观效应,但是,在尧山圣母信仰此后的发展过程中,伴随森林资源遭到破坏的区域背景,尧山地域景观、特别是森林景观有一个景观价值凸显的过程。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尧山保存下来的森林是构建尧山圣母这一信仰景观的要素之一。仅森林景观本身,因其稀缺性与独特性的价值,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风景。下面首先对这一方面展开相关探讨。

作为地域景观,唐以后尧山圣母庙周围保存的少量森林植被,已经得到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特别是松柏等常青类树种更是具有景观象征意义。前文已经述及,卓尔不群的高度和山间的清泉,在尧山自然景观形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于尧山的常绿林木,特别是古柏因其独特的景观意象而为人们所乐道。而且在明清时期超越尧山圣母信仰本身而成为“蒲城八景”之一。“尧山古柏”作为蒲城八景之一,据县志所载,八景作为地方志书的一个传统,可能也不过明代之事。但现有文献已经很难确知其具体成景的时间,现存最早的清康熙《蒲城县志》,对“尧山古柏”的记载如下:“蒲地宜柏,而尧山柏异他植,以其根盘岩石,坚老特奇,即其时远而摧,几不如古。犹幸有一干举天,足备栋梁。其萌芽触石出者,疎叶嫩枝培养

护持,俟之今日矣,犹古柏也。”^[11]从颇具代表性的地方性文献——县志里面的表述就可以发现,“尧山古柏”已经超越自然景观本身,具有一种精神象征的意义。具有特别意义的森林景观,除去其在尧山圣母信仰形成中的重要景观意义以外,也成为地域社会人们重要的休憩游览之地。“及时(清明庙会时),城中诸士女,车马连翩,登临览胜,且散步青云寺,桃花花、药王洞、古柏,恣一日之游观焉。”^⑧可以发现,这里的尧山已经因其丰富的自然及人文景观遗存成为人们的游览登胜之地。其实,尧山的自然景观以其特有区域景观特点,直至今日仍是人们登临赏景的重要地点。“尧山系三秦著名胜景,青山叠翠,古柏盘岩,清泉似镜,鸟语花香,并有唐宋刻石,古代遗迹。”^⑨

上述自然景观方面的价值以外,森林植被的存在,也在信仰形成的过程中具有实际性的功能。求雨作为尧山圣母信仰的主要功能之一,在求雨仪式中的取漱是必需程序。在这一过程中,泉水资源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必须性的资源。因此,保证泉水资源的连续性,就成为保证求雨仪式完整及信仰对象本身延续性的关键之一。此外,从生态景观学的角度而言,泉水的存在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首先,就表象景观而言,虽有高山、古柏,但泉水资源作为区域紧缺性景观构成要素,“尧峪仙坪”的山泉作为景观构成的要件之一,在整个生态景观的构建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其次,从生态学角度而言,泉水资源具有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作用,是构成完整生态循环系统的关键环节。最后,“山有清泉古柏出焉,土人因经营殿宇……”^⑩人们能够在难以取水的尧山之上建立庙宇,维持其基本运转,正是因为尧山泉水的存在,才能够保证庙会等相关活动的正常举行。

通过前面的分析,从信仰景观,特别是尧山圣母的求雨功能而言,泉水资源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泉水的长期存在,则有赖于一定森林植被的涵养水源作用。但是,就现有资料而言,历史时期,尧山山脉绵延十多公里,不是尧山圣母庙所在的“尧峪仙坪”这一特定地点拥有泉水资源。“浩泉:《西安府志》在县西二十里。县志,桥陵前有浩泉,今涸。”^[12]后出的光绪《蒲城县新志》,记载得更为详细。“浩泉,在县西二十里桥陵前,旁有莲子池,泉久涸,池亦荒迷。”^[13]浩泉在历史时期已经干涸,而干涸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能就是缺乏水

源涵养地。而尧山圣母庙附近的泉水资源却因森林植被涵养水源的作用,一直“清冷不竭”,保证了尧山圣母信仰的求雨仪式及庙会相关活动的开展。由此可见,以森林为核心的自然资源,不论是单独作为显性景观,还是作为维持这一景观的要素,在尧山圣母信仰景观形成及维持其发展的过程中,都具有基础性的地位。

当然,以上主要讨论了“尧山古柏”在尧山圣母信仰景观构建中的作用。与此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树木和森林资源是这三者之中最易受到破坏的要素,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这一地区的森林资源何以得到保存?随着地域开发进程的展开,尧山圣母信仰区周边的森林资源应该是得到了特别的保护,那么,保护的原因和保护主体又是什么呢?可能尧山古柏与尧山圣母信仰之间,除去古柏的自然景观效应,可能在此后的历史时期,尧山圣母信仰的存在,尧山古柏也得到了相应的保护并维持了这一孑遗森林植被。

秀水灵山,尧山古柏与清泉在圣母信仰形成及景观的构建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景观象征作用。相关文献资料显示,尧山古柏和清泉在人们每次述说相关灵应活动时必然提及。特别的自然景观,已成为人们感受尧山圣母之灵验的重要基础表象。那么,二者除去前面分析的关系之外,是否尧山圣母信仰本身也维持甚至保护了区域的森林植被呢?孟泽思在有关清代森林研究中已经指出,历史时期森林保护较好的地点之一就是寺庙,“从根本上来说,寺庙和寺院森林是受保护的生态系统。”^{[14](P71)}而尧山地区的森林资源也不例外。而且尧山森林资源的保护者正是庙宇的管理者和尧山圣母信仰者。关于信仰与森林之间的关系,在下面这段材料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神树不可伐》:“尧山庙东角原有一棵大树,年深日久,树身中空。尧山庙主持把这棵树卖给县城一家木匠铺。掌柜交了钱,便带领木匠一帮人上山伐树。大伙收拾家具做准备工作,忽然一个人看见有个女人头戴凤冠骑马提刀,一下子又不见了。这个人把所见告诉掌柜。掌柜一听,知道是神显灵,就让匠工下山。树不伐了。有人问:‘钱已出了,咋个不伐了?’掌柜说:‘权当给神送了香钱。’”^⑪

虽是传说故事,从森林景观与尧山圣母信仰的关系的角度而言,至少提供了三方面的信息:第一,尧山的林木拥有明确的产权,即归尧山圣母庙

及相关组织所有,因而是受保护的林木资源。作为尧山圣母信仰区整体性自然景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尧山古柏在发挥其景观效应的同时,也受到了相关庙宇管理者及其信众的保护。第二,可以说,尧山林木与圣母信仰已经合成为一体,成为尧山圣母信仰这一特定自然人文景观的组成部分。第三,尧山地区的林木资源有自然枯死现象。从这三个方面可以发现,不论从现代的产权观念出发,还是从民间信仰景观的角度而言,尧山地区的林木资源已经成为一种受保护的资源。

关于尧山林木资源自然枯死现象,虽有人们的特意保护,林木资源的自然枯死,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除去尧山林木资源成为一个受保护的生态景观资源以外,人们在这一地区的有意栽植,也是尧山林木得以维护的重要原因。“是年随代栽柏树五十四株。”^①而且在捐献的名单中,也有信众“姜君柏树一个”^②一类的捐助内容。可以发现,人工植树也是区域景观,特别是林木资源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得以存在的重要原因。从此意义上而言,仅在自然景观的构建过程中,已经有了人造景观叠加效应的存在。

另外,从整个地域社会的角度而言,尧山古柏在千余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能够得到信众的保护,除去其自身的独特之处,至少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就自然景观的角度而言,在历史早期高山、森林和清泉的景观在这一区域可能并不十分突出,但伴随着地域开发进程的森林资源开发,使得尧山地区孑遗林木及与之配合的高山、泉水等自然景观资源,在此区域变得稀少,特别是森林资源变得更为珍贵的情况下,“尧山古柏”在这一地区也才被视为具有典型意义的地域景观体。第二,在尧山圣母形成以后,这一地区的森林植被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已经成为一种受保护的、有特定景观意义的自然存在,得到了区域社会人们的普遍认可,而且得到了信仰者的维护。因而,从此意义上而言,它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森林植被,而成为维持尧山圣母这一信仰景观的要素之一。

四、结语

区域自然景观的历史变迁得到关注的同时,自然景观变迁背后的景观效应也应该得到应有的关注。而本文正是通过对尧山圣母信仰形成及其在历史时期的发展过程中与区域自然景观要素之间的关系探讨,特别是对森林植被变迁在构建区

域性的尧山圣母信仰景观形成过程中多样性影响展开梳理,重点分析了森林资源在这一地区作为稀缺性景观的凸显过程,这一过程造成的可能景观效应及象征意义。在唐代以前作为地域自然景观,以森林为核心的景观资源在尧山所在的关中东部地区,可能表现得并不十分突出。但是,伴随地域开发而来的森林资源开发利用,使得森林资源的景观稀缺度得以凸显。此后,因地处于干旱区域及人口增加带来的农业生产压力,使得以求雨为主要功能的神祇在区域社会的出现成为一种必然。而尧山,特别是“尧峪仙坪”的森林植被及清泉等资源,成为构建信仰中心的基础性景观要素。因此,在尧山圣母信仰的形成过程中,由于人口增加造成森林植被的改变,森林植被改变又造成其区域景观性的凸显,而这样的景观特性又成为这一区域人群构建以求雨为主要功能的地域性信仰的基础景观要素之一,其中存在一种内在的耦合性关系。

尧山圣母信仰形成以后,可以说,正是尧山圣母信仰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和发展,使得在整个景观构建中具有基础意义的森林资源得以保存,加上区域信仰群体的保护和维持,使得这一独特的景观更增加了尧山圣母信仰的灵验与神秘。可以说,以森林资源为核心的自然景观在这一地区的凸显,是伴随着地域开发、森林破坏和圣母信仰形成的综合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森林因信仰而变得神圣,受到特别的保护,而森林稀缺度的进一步凸显更增加了尧山圣母信仰的神秘性。两者之间构成一种内在的互保关系,进而形成了在唐以后的历史时期这一地区所少有的自然人文景观综合体。最终在这一地区完成了“即其石生古柏,崖涌甘泉,亦蒲邑之大观也”^③的景观构建过程。

从尧山圣母信仰形成和此后的发展两个不同时期,对这一区域的森林变迁与尧山圣母信仰之间关系的讨论可以发现,作为人文景观的尧山圣母信仰,在发生、发展的不同时期,与区域森林植被变迁之间存在一种从形成期的耦合关系,向发展期的互保关系的转变。但是,不论这样的关系发生何种变化,森林植被状况在其中都占有基础性的地位。

注释

- ① 此前关于尧山圣母信仰的研究,有秦建明,(法)吕敏编著“山陕地区水资源与民间社会调查资料集”(第二集)《尧山圣母庙与神社》,北京,中华书局,2003。此书主要以资料汇编为主;庞建春:《旱作村落雨神

崇拜的地方叙事:陕西蒲城尧山圣母信仰个案》,载曹树基主编《田祖有神: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机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上海,2007。

- ② 无题名与撰写者,这些文字现存尧山圣母大殿后东北方向的崖壁之上,竖刻楷书。又见秦建明、吕敏,前揭书碑刻摩崖部分。
- ③ 窦邦杰.重修尧山灵虚观记[Z].立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原碑现存尧山庙西侧石崖下龙王洞门外。有个别字风化严重,难以辨认。又见秦建明、吕敏,前揭书碑刻摩崖部分。
- ④ 万明远.重修尧山灵应夫人庙碑记[Z].原碑立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现存尧山圣母大殿外台阶下东侧;又见秦建明、吕敏,前揭书碑刻摩崖部分。
- ⑤ 佚名.上王庄一社创修三圣母祠记[Z].原碑立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碑现存尧山圣母庙新修大殿外台阶东侧,又见秦建明、吕敏,前揭书碑刻摩崖部分。
- ⑥ 何亦韩.祷雨灵应碑[Z].立于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原碑现存尧山圣母大殿台阶下东侧。
- ⑦ 王炳.善士修庵成公捐募增修尧山神庙功德碑记[Z].原碑立于康熙五十年(1711),现存尧山大殿外台阶下东侧,又见秦建明、吕敏,前揭书碑刻摩崖部分。
- ⑧ 李馥蒸.无题碑[Z].清顺治九年(1652)立,碑现存尧山圣母庙新修大殿外台阶西侧,主要讲述了新修尧山庙和官员捐款等内容;又见秦建明、吕敏,前揭书碑刻摩崖部分。
- ⑨ 佚名.建设尧山旅游区捐款人名录[Z].立于1993年,原碑现存尧山大殿外台阶东侧,又见秦建明、吕敏,前揭书碑刻摩崖部分。
- ⑩ 佚名.树尧山圣母旗杆碑记[Z].原碑立于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原碑现存尧山圣母大殿外台阶下东侧;又见秦建明、吕敏,前揭书碑刻摩崖部分。
- ⑪ 《神树不可伐》,载《尧山传说故事集》(内部资料),2007年;又见秦建明、吕敏,前揭书第一部分附录一。
- ⑫ 贺□□.重修尧山圣母庙□戏楼碑[Z].原碑立于清

光绪三十三年(1907),现存尧山圣母大殿外台阶下东侧;又见秦建明、吕敏,前揭书碑刻摩崖部分。

- ⑬ 原碑无题名及作者,从碑刻的内容分析,篆刻时间应该在清康熙年间,原碑的碑阴为刻于清嘉庆五年(1800)的《修神场山门闾王匾碑记》;内容又见秦建明、吕敏,前揭书碑刻摩崖部分。
- ⑭ 王道枢.创修尧山圣母天华板记[Z].原碑刻于清乾隆八年(1743),现存于尧山大殿外台阶下东侧;又见秦建明、吕敏,前揭书碑刻摩崖部分。

参考文献

- [1] 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M].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
- [2]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3] 王勇.秦汉时期关中农业发展的地域差异[J].史学月刊,2004(08):16-17.
- [4] 刘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5] 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
- [6] 王昶.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7] 薛平栓.陕西历史人口地理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8] 王元林.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5.
- [9] (康熙)邓永芳.蒲城县志[M].康熙五年刻本(1666).
- [10] 蒲城县志编纂委员会.蒲城县志[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
- [11] 聂树人.陕西自然地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 [12] 张建.蒲城县志[M].乾隆四十七年(1782)重修本.
- [13] (光绪)李体仁.蒲城县新志[M].光绪三十一年(1905)刻本.
- [14] [美]孟泽思.清代森林与土地管理[M].赵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张瑜)

From Nature to Landscape: the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st Vicissitude and the Belief of the Goddess of Yaoshan HOU Xiao-dong

(College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Baoji University of Art and Sciences, Baoji 721013, Shaanxi)

Abstract: The forest vicissitude of the loess plateau in the historical period is not only the change process of natural vegetation, but also the renewal process of the regional landsca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landscape change, such a change not only brings about changes in natural environment, but also produces corresponding landscape effect in culture. Through the yaomountain forest vegetation change process and YaoShan god faith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formation, can be found in the forest ecological landscape from belief formation, mainly engage to lat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changing process of landscape.

Key words: forest vicissitude; landscape effect; the belief of the goddess of Yaoshan